

第二代 中国现代文学 学者自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冯济平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陈建功

第二代 中国现代文学 学者自述

冯济平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冯济平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4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ISBN 978 - 7 - 5039 - 5038 - 4

I. ①第… II. ①冯… III. ①作家—列传—中国—现代②现代文学—中国—文集 IV. ①K825. 6②I206.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307 号

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

编 者 冯济平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倩 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007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038 - 4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主编 陈建功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主 编 陈建功
副主编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总序

国人自古重“史”。而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鳞半爪，也会使史家乃至读者如获至宝。在文学历史的阐述、文学理论的论证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新史料的发现当然也每每相伴而生，同样为新的立论和新的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更有学养深厚、学风笃实的学人，常常会把搜集所得的资料，整理编撰，既是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服务，亦可供他人参考。这些资料，我们并不陌生，在林林总总的校点本、辑佚本、笺注本、年谱、诗文系念、书目、索引里都可窥其面貌。比如，鲁迅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曾搜集了大量的小说史料，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这自周至隋的36种散佚小说，毫无疑问成为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这正是“钩沉”的价值。梁启超所谓的“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我们了解前人所思所想，乃至理解“人类社会史可能性的一切”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这些“痕迹”的再发现，无疑多多益善。

作为集文学资料中心、文学展览中心、文学交流中心、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著、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在和广大的研究者、作家及其家属、后人接触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到曾被历史遮蔽、湮没、忽略的有关人物及有关史料，因此，编辑、出版“钩沉丛书”，是水到渠成之事，也是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套丛书，旨在把我馆认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涉及现当代文学的史料予以发掘，把某些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带有资料性的著述予以出版。举凡作家的年谱、回忆录、传记、散佚作品等均在丛书出版范围内。这一工作，有赖于著述者的劳动，也有赖于广

大作家及其家属、后人的支持，这是需要向著述者和支持者致以诚挚谢意的。

然而，我以为不能不指出的是，“钩沉”是有价值的。但“钩沉”出来的，却未必件件都有价值。

因此，其一，本丛书所含所有书籍的出版，惟以我馆认识到的参考价值为取舍，是否真有“价值”，有待研究家和读者的考量与开掘。其二，“钩沉”，绝不是为了“爆料”，为了“翻案”，为了“听唱翻新杨柳枝”。这在世道浇漓学风蒙尘的当下，是不能不有言在先的。也就是说，若有人欲借本丛书中涉及的一些史料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谋取商业利润，概由炒作者自负其责。本“丛书”所涉及的资料和史实，并未经过本馆的考证与甄别；所涉及的观点，只代表编撰者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学术见解，与文学馆的立场、见解无涉。

如果诸公能够从这套丛书中获取一些资料，经过甄别辨析，成一家之言，作为丛书出版的组织者，便欣欣堪以慰之。

是为序。



2010年5月7日

序言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前后大致有四代学者。20世纪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研究还只是“潜学科”，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到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配合共和国修史，进入大学的教学体制，一度成为“显学”。一般认为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①是这门学科成立的标志。通常又把王瑶先生那一代学者，包括李何林、唐弢等宗师，看做是现代文学学科最初的垦拓者与奠基人。他们是这个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一直到80年代，都还有力地引导和支持着学科的复苏，对整个学科始终有覆盖性影响。关于这一代学者，另外有一本学术叙录呈现他们的风采。

现代文学研究走过坎坷曲折的路，“文革”期间这个学科研究停顿，几乎遭受毁灭，直到80年代前期，受惠于思想解放的动力，才恢复元气，并取得在人文学界令人瞩目的实绩。第二代学者主要就活跃于这个时段，充当了80年代以来学科复苏与发展的生力军，在9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仍然担当许多大学与科研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这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的一代。

接续而来的是第三代学者，基本上是“文革”后上大学或研究生的，这代学人有曲折的求学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富于学术个性与锐利的研究实力，后来各自在相关领域开拓新生面，所获也甚为突出。近年来，第四代在学界崭露头角，有的已形成自己的格局，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很多是“60后”或“70后”，思想开阔，富于活力。目前第一代学者大都离开了我们，第二代也年届古稀，他们中一些人炉火纯青，仍有坚实的学术著述出版。但活跃于学界的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主要是第三和第四两代学者，而且重心正逐渐转向第四代。代际转移，学风流变，其变迁大势如大江推浪，读此书真有沧桑之感。

本书收录的是第二代学者的自述，一共收有30位。包括：邵伯周、孙中田、彭定安、许怀中、陆耀东、曾华鹏、林非、朱正、陈鸣树、乐黛云、范伯群、田本相、吴小美、严家炎、魏绍馨、朱德发、许志英、刘增杰、黄侯兴、冯光廉、孙玉石、黄修己、吕进、易竹贤、黄曼君、骆寒超、董健、王景山、陈美兰、洪子诚等等。我认真拜读了其中部分书稿，收获良多，感触频生，这里不妨说说自己的体会。

第二代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大学则在50年代，少数学者60年代已经成名，但多数都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鸿图大展，成为杰出的专家。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

其次，是对学科研究的执著与专注。可以和前辈做点比较。第一代学者做新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古典文学或其他领域转过来的。王瑶先生就如此。北京刚解放时，王瑶在清华大学任教，本想“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①他是在新中国成立蓬勃气势的推进下，把“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重头课程来开设的。他们很多人后来虽然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但“根”仍然伸展到古典文学及一些相关领域，那一代曾浸淫于旧学，又较早受新潮启迪，学养与兴趣较自如而深广，有的可以同时的几个领域用力，打通不同的学科方向。那时的学科分工也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如50年代前期北大中文系一个“文学教研室”就把所有治文学史的学者都囊括其中，搞古典

① 参见杜诱编《王瑶年谱》，《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的与搞现代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壁垒鲜明，彼此还有贯通流连的空间。后来专业越分越细，每个学科自成一统，不同学科彼此的关联少了，每个学者都抱着一块来做。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学科界限太严是个缺失，但好处也有，就是“专深”。一提到某某学者，马上联想到的不是“现代文学专家”，而是研究某个作家或者某一方面的“专家”。这种专门化的学术体制，对于学科初建时期有积累意义，而且促成了一代学者对于专业的执著。和第一代学者比，第二代是很“专”的，和后两代比，这个“专”也很突出，而且普遍都很执著与认真：他们都非常自信地以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整个学术生命的依托，他们的生活与学术往往是融为一体。

第二代学者的学业完成及学术道路选择，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特点，政治运动太多，他们很难有完整的上课时间。与他们老师一代比较，学术训练的功底可能有不足，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但他们中很多又都是文学青年出身，本来就喜爱文学，研究文学是他们的“志业”，读的书比较多，上大学时写作能力就基本过关。这些条件又都是非常优越的。所以尽管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被耽误了学业，但他们也充分发展了各自的优长。80年代改革开放后，学术与教学得以复苏，逐步走向正轨，这一代学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多怀抱学术热忱，一边教学，一边寻找属于自己的学术方向，多年的学术积累至此终于找到喷发的机会。这一代学者最重要的著作或教材大都是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能代表所属领域最好的研究水准，他们中一部分人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各自学科方向的带头人。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对学术抱有真诚与尊敬，他们的学风是严谨扎实的。王瑶先生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观点，在这一代学者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即坚信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文学史的研究，“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①。这一代学者大都注重史料和作

^① 这些观点与这一段相关引文见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品，不尚空谈，学风严谨扎实。具体到每个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研究兴趣与重点，但都讲求学理性，不满足于做评论鉴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也作为文学现象，考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①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来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再往前追溯，发现他们中不少人都倾心于鲁迅式的研究方法，即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

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做学问也如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第二代学人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相当充分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留下的不止是一批杰出的著作，也不止是他们的弟子传人，更有他们崇高的学术追求与丰沛的学术精神。

这本书把30位第二代学者的学术自述汇聚在一起，回顾总结几十年的学术道路，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多元而又有整体感的对话。一代学人的立场观点自然会有参差，统而观之，有很全面多样的角色搭配，历史的均衡性就此得以呈现。这是鲜活而真切的学术交响，是一代学人的多重奏，历史的节律中也时时荡漾出现实的回响。

参与该书对话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辈，有的就是教过我的老师，我是读他们的书进入学界的，现在再静下心来集中聆听他们讲各自的学术道路，好像又回到课堂上，感到那样亲切，的确很有收获。这些年我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是引导学生入门的，也会讲到前人的治学理路，但那是轮廓性的，学生不容易获取学术体验。现在有这本书，都是过来人鲜活的经验，我觉得很受用，我想应当推荐给学生好好研读。

《东方论坛》杂志社冯济平女士主持编写这套书，是做功德无量的好事。这本书中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东方论坛》2004年始设置的“学者自述”栏目上，现结集出版。读这本书，看诸多论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就现代文学发言的，他们用的是什么角度、理论和方法，对“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

① 王瑶：《治学经验谈》，《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有过什么影响，能拓宽视野，让我们了解所谓文学史的研究，是可以从不同层面进入的，不同的时代需求及为其所制约的历史环境，会对文学史研究的“生产”发生重大的影响。而正是处于动态的多种文学史研究与评论，共同地逐步地建构了“现当代文学”的独立学科。读这本书我们获得了学术积累的连续感，这使我们在面对许多“新”课题时，会自觉地联想到前辈学者所曾摸索过的道路，同时对当下那些动不动就颠覆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保持一份警惕。

2010年7月7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导 论

冯 济 平

一、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

人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各代学者都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接受时代思潮、理论观念、社会心理、文化风尚、学术传统等多重影响，形成各自的学术道路、学术追求和学术特色。像树木的生长留下清晰的年轮一样，各代学者的成长历程也显示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对不同代际学者的成长道路和学术特质的深度研究，能够明晰地洞悉学者和时代、学术和历史、学术和政治、个体和群体、主流话语和学者话语、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复杂联系，显示特定的时代如何铸造了众多的学者，而这些众多学者的学术历程和研究成果，又怎样地反映了时代现实、理论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变迁。研究各代学者的成长道路、学术成就和学术特色，是撰写学术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对学者的代际研究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剖析，而是对不同时期学者群体的综合审视。学者的代际研究有助于摆脱孤立、狭窄、零散的方法论局限，获得宏观性的整体性的研究视野，有助于实现对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演进规律进行综合把握，而这正是学术史所应包含的中心内容，所应完成的基本使命，也是研究代际学者必须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

学者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队伍的成长和发展既有一般人才共同的成长规律，也有其特殊性的个性差异。学者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比较易于成长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又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容易出现退步萎缩，遭遇沉重的危机，甚至导致学术生命的消亡？学术大师的造就，学派的产生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在这方面存在哪些应该深思的问题？哪些政策措施机制方

法能够促进杰出人才的出现，哪些政策措施机制方法则会扼杀杰出人才的成长？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高校和科研机构下放到偏远地区去办，现行以应试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教学和科研的量化管理制度、评估方法体系和职称评审办法，对于人才的培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其经验教训在哪里？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学者的品格如何坚守，防止异化；如何处理好个人和国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必须依靠社会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来实现。而对学者代际问题的研究，恰从一个重要的层面，去梳理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教训，提炼人才学的理论成果，升华人才学的理论建构，促进中国人才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和成长。

学者代际问题的研究，还具有直接的现实应用价值。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队伍来说，随着王瑶（1989年去世）、李何林（2004年去世）、唐弢（1992年去世）、任访秋（2000年去世）、田仲济（2002年去世）等先生的去世，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老一代学者就再不能直接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际进程，而其他以后的学者当今都还在进行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对于这些现存学者而言，学者代际划分的研究既是对整体队伍的再认识，也是对个体自我的再反思。这种再认识和再反思的成果，可以在大小不同的范围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从而为不同代际学者间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有利的平台，为学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各种学术研究课题的推进，各代学者的和谐共处以及代际的传承接替，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这种研究还有助于国家和地方各部门制定人才培养战略，以便造就更多的人才，确保在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类的发展历史是沿着一代接一代的轨迹行进的。学者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呈现出现代代相互联系和彼此链接的特点。同代学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通常面临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有类似的历史经验，相近的教育与人文背景，这必然会对他们的思想学术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构建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学术形态，并以此同它代学者形成质的区别。这种自然形成和不断演进的社会客观实际，提供了进行学者代际划分的可能性。只要认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队伍的成长历史和发展历程，便可以清晰地

看到不同代际学者在年龄、学历、治学道路、学术追求、学术特色、学术优长和局限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积累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凭借这些客观存在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成果，进行宏观性的梳理、分析、研究，进而做出科学的归纳，划出不同的代际。

对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进行代际划分研究，大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代表性的论著是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有一处是论及这一问题的。1997年刘增杰先生在《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述及到这一问题。1998年樊骏先生在评黄修己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时亦曾热情地肯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2005年温儒敏先生等所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则论述了鲁迅研究的学术梯队的代际衔接问题。很清楚，从以上发展趋向看，研究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已经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论著不仅从各自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富有启发性的论述，而且逐渐造就了探讨这一课题的良好态势，引发了后来者继续思考研究的兴趣。本文的写作也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进行的。当然，他们由于受到各自论著的指导思想和撰写需要的制约，这些有关论述都显得比较简略，涉及的方面不够广不够多，并且还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不一致。这些都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启示后来者去进行更为集中更为完整更为系统更为细致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现有的论著都着眼于年龄和学历，即以哪个年代出生，哪个年代毕业为分代依据。不过，在具体划分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归属时，不能单纯以年龄和学历作为标准，还应该考虑到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出生年龄和实际进入学术研究活动的时间的不一致性。例如，钱理群、吴福辉先生均出生于1939年，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据此应将他们划入第二代学者群，但实际上他们大学毕业后并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他们开始学术研究活动的时间是在80年代。故而，不应该将他们划入第二代，而应划入第三代（当然，如果以他们80年代研究生毕业时间来计算，同样应该划入第三代）。其二，按学历划分代际也会出现漏洞。如唐弢先生（生于1922年），他是自学成才，并未读过大学。像这类自学成才的学者，就无法机械地以学历为依据来对他们进行代际划分。正是考虑到以上种种的情况，我主张：以年龄

和学历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学者实际进入学术研究活动的时间,将以上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学者划代的标准。这样做似乎显得全面严密一些,包容性大一些,不容易产生歧义,避免出现上述之类的破绽,从而能够体现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学术品格。

现在有的学者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际研究时,主张将同时期创作者和研究者并在一起进行整合性的分析阐释。这种做法对于思潮史的研究确实比较合适。因为所谓思潮,应该包括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两大部分。而且有的学者同时又是创作家,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钱钟书、李健吾等。在他们的成果中,既有各种体式的文学创作,也有理论的历史的研究。将他们并在一起研究,有助于揭示理论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从两者的联系中梳理其成就和个性特色。但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兼为创作家,一身二任的实际仅仅是少数人。而且这些学者的研究范围大都相当广泛,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仅仅局限于思潮史问题。因而,从学术研究队伍的整体情况考虑,似乎还是应该严格限制范围,不将众多的创作家和研究家并列,一并收入,而仅仅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作为划代的对象。至于兼作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作家,自然可以包容进来,以体现学者队伍构成的完整性。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从什么时间开始,现在有两种主张和做法:一种是以近百年为划代的时间范围。即从19世纪末为划代的起点,一直延续到现在。按照百年学术发展的历程和学者队伍的总体状况划分为若干代。这样做的好处是:视野比较开阔,能够有效地保持近百年学术时空的完整性,可以从更长的时段上来总结学者队伍的结构状态、代际链接、经验教训,容易获得学术历史的连贯性和厚重感。一种是以当代为划代的时间范围,即按照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的学术发展历程和学者队伍的情况划分为若干代。这样做的优点是,突出学术史研究的当代性,更完整更鲜明地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特点。我赞成后一种主张和做法。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新中国成立以前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整个的理论思潮、社会心理、文化风尚、环境条件、教育科研管理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学术道路、治学方法等等,都出现了新的特点。为了更鲜明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这种巨大变化和特点,缩短历史时空的距离感,增强划代的当代

性，我认为以当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划代的时间范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我赞同对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作如下划分：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三四十年代毕业的，如李何林先生生于1904年，20年代即开始学术活动，40年代著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王瑶先生生于1914年，40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文章。田仲济先生生于1907年，代表作《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于1947年。任访秋先生生于1909年，30年代开始著作活动，1944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毕业的，现在年龄约七八十岁左右。第三代是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毕业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现在年龄大多在五六十岁。第四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这种以年龄和学历为主要根据的划代标准，是目前最为通行的一种，几乎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的基本方法是分析和综合方法。即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队伍的总体特点，先对其个体进行微观性的分析研究，了解进入划代学者的年龄和学历状况，其进入学术研究活动的时间，编著的基本情况，取得了哪些学术成果，具有怎样的价值意义，学术界对其有怎样的评价。在对现代文学个体学者准确详细了解的基础上，再将相近类型的学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综合，概括现代文学各代学者群体分别具有怎样的共同特点，有什么显著的成就、特点和专长，又有什么样的弱点、缺点和局限，这些形成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包含有怎样的历史经验教训，显示什么样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分析是综合的前提和基础，综合是分析的概括和提升。现代文学学者个体的分析如果做得不够准确，不够详细，现代文学学者群体特点的综合便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和保证，失去了客观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同样，如果综合的工作做得不好，整体性的特点、本质、规律便难以认识，零碎、片段、混乱的情况便极容易出现。可见，将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研究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问题的方法论基石。按照分析—综合的方法论的要求，检视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这一学术工程，恐怕目前只能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我们对于数以千百计的学者的个体情况了解得就不多、不细、不准。特别是现今尚没有公开的学者队伍情况的系统材料，这就给学者的代际划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现